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顏剛吾先生
教正
不
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433B



15600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羅家倫

真實的時間和空間相合而構成『事』(Event)。事和事是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有歷史。事之中以人事最爲複雜，最爲靈動，最有趣味，而且關係人類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歷史的需要也最切。至於史書，不過是這種人事歷史研究過後，史學家認爲值得記載的記載。

因爲事與事間的推動和影響，常有交互聯系的軸紐(Axis)，一切事物如此，人事更是如此，——所以歷史有各種的組合，各種的集團。如人事歷史的研究，就其所處地域來分，便有所謂國別史等等；就其所發生的時間次序來分，便有所謂通史、斷代史等等；就其某項事的組合的重要性來分，便有研究專題的史，如文化史、經濟史、某次戰史等等。這都是就研究的便利，利謀研究對象易於專精而劃分的。

人事間相互的推動和影響，也和自然界受動力的支配一樣，愈近的力量愈大。用一個粗率的譬方來說，好象水中拋了一個石子，最近的圈子所受的推動最大，愈遠愈淡下去了。（這還是從內心看到外邊去，其實應當反過來看。）所以最近人事的歷史，影響於

人類或是人類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這不是說遠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說近的切的更當研究，尤爲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須研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

說到時間空間的本質，原來是不可以割裂的。所以歷史有兩個特性：一個是連續性，一個是交互性。近代史的名稱，也不過是就研究便利而劃分的一個段落。就歷史的連續性而論，不是說近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可以不問過去一切的，如西洋近代史有許多西洋史家祇從法蘭西大革命講起。這不是說法蘭西大革命以前，西洋就沒有文物制度。也不是說法蘭西大革命一起，西洋的文物制度，一齊變了。巴斯梯陷落的日子，不能把法國的公鷄變成母鷄。文物制度的變更，雖不能拏這話來做極端的形容，但是要把他一旦變了，其困難和不可能，也差不多是和公鷄變母鷄同樣罷。須知巴斯梯陷落以後，法國人還是照樣的生活照樣的起居，不過史學家爲研究便利，和認定這件事對於某方面的重要性起見，姑且把他做一個重要時代的開始。若是把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講起，也不是說近代的中國，就始於鴉片戰爭。別的不說，即就中國對於西洋交通一事而論，也不

是從這個戰爭開始的。近之如十六世紀中西海路交通，如方濟各、利瑪竇的東來，和西洋文化與商品的輸入；遠之如中西當漢唐時代在中央亞細亞的交通，和中國由西北所受希臘與亞刺伯文化的影響，那一件不應當提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不能真正閉關，海禁大開，也祇能注重這個大字便了。如果史學家從鴉片戰爭開始講中國近代史，也不過是爲研究便利，和認定這件事對於中西短兵相接後所發生的各種影響的重要性起見，把他當作一個重要時期的開始而已。原不是認爲這個時代，可以和以前的一切歷史分開的。

就歷史的交互性而論，則中國近代史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對象。我方才說過，中國和西洋的接觸，並不從最近開始；但是在最近一段裏，中國確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許多國際的關係，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影響。不祇是軍事、經濟，和所謂一切物質文明，因此發展了新的局勢，而且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基礎，也因此受了劇烈的震動和變更。現在沒有幾件中國的事實，是可以離開世界的環境講得通的。要研究中國政治的改革和變動，非打通國際的情形來看不可；要研究社會的改變和生活，非綜合他國的現象來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進，非考察世界的學術思想不可。（從具體的一件軍事來講，譬如英法聯軍戰爭一役，英軍因亞羅號事已於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三

日起，開始軍事行動，攻下炮台，炮擊兩廣總督衙門了。到一八五七年全年幾乎戰爭中止，大家都很莫名其妙的——葉名琛則相信扶乩，乩仙說過了陰歷八月十五日英軍不來，則不再來！——那知中止的原因是因爲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印度叛變，英國大使額爾金（Elgin）把英國調來的兵，在中途——新加坡——轉調到印度平亂去了。到該年年底，印亂已平，英兵來華，於十二月十九日與法國合兵攻下廣州；於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葉名琛被俘。設如不打通世界大勢來講，則戰事中斷一事，如何可以講得通？設如印亂不平，英兵始終不來，則葉名琛的乩仙，豈不真是千靈萬靈，有退兵之術嗎？若是從大家可以看得見的方面來講，則在這個時期之內，發生了五個重大的對外戰爭：鴉片戰爭（公元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英法聯軍戰爭（一八五六一至一八六〇年）中法戰爭（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八國聯軍戰爭（一九〇〇年）——那一個不是和外國直接的衝突，那一次衝突不在國外國內發生重大的影響？還有兩次大革命——一次是太平天國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何況產業革命，思想革命，和國民革命，正是繼續進行，沒有停止呢？所以這個時期，實在經驗了亘古未有的大變。我們無論是對於歷史的真象負責，無論是對於民族生存的適應負責，能夠不

研究嗎？

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實際的需要，也是知識的要求；但是中國現在看重這種研究的很少——當然，帶營業性的中國近代史出版物也很多，學術界卻不能認爲研究——這也有些緣故。第一是因爲學者的好古心，覺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不可一概而論，有許多真正的古史學家，並不忽視近代史的重要。）第二是因爲恐怕時代愈近，個人的好惡愈難避免，深怕不能成爲信史。第三是因爲恐怕有許多材料不能公開，將來發見以後，他人再來重寫，自己的著作不能成爲定史。其實這三點都不能成爲研究近代史的理由。第一，從學術的眼光看去，什麼材料，都應當平等看待。古代的殘磚斷碣，對於歷史的重要，不見得就高於近代的告示公文。我們不能因爲他難得而重視，更不能因爲他常見而鄙棄。須知今日的告示公文，若是保留到幾千年後，將來史學家何曾不是把他當作巴比倫的殘磚，埃及的古碣，或是『流沙墮簡』一樣的重視，加以冥思暗索呢？同是史料，與其等將來稀少的時候，再來視如拱璧，何如當現在多的時候，還有較大比較研究的機會呢？史蹟重在親見。從前司馬遷研究孔子，自己說：『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司馬遷這種實地考察的精神，非常可佩。但是可惜他所看見

的，還不過是漢朝孔子廟堂裏的車服禮器，設如他能看見孔子時代的車服禮器，豈不更好的嗎？還有許多實際的情形，是要靠當代人口述的。章實齋說：『余修永清縣志，親詢鄉婦委曲。』設如時代湮遠，生活態度改變，章實齋又何從得鄉婦而親詢？第二，因時代太近，恐怕牽涉自己的好惡，的確是一件可顧上的事。史學家重在客觀，不能以主見來影響事實的真象。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史學家一個重要的信條。（但是史學家對於史料的選擇，和史事的了解，自有標準。史事被史學家了解的時候，已自成一軸紐。這個道理，和我在本文頭幾段所說的道理，當另有一文討論。）『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這話是近代史學家應該刻刻記在心裏的。但是卻不能因噎廢食。孔子是最明白這道理的人，所以他作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其中有七十三年，便是他自己經歷的時代。司馬遷做史記，不在漢武帝以前停止。再舉西洋的史學家來說罷。西洋史學界的父親Herodotus所記，便是他從埃及等處親自見聞得來的。希臘大史家Thucydides是親自參與Peloponnesian戰役的人，但是他寫的Peloponnesian戰史，是一部很可靠而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著作。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關於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克服泰安的戰役，據總司令部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說是四月二十七日克服的。

見報告第
五十七頁

但是我於五月一日過泰安，看見泰安城上，還是褚玉璞的兵。設如後來發現任何人在泰安圍城中的日記，便要起爭論了。因為負責的機關長官，向負責的會議的報告，一定是很可靠了，而且就情理而論，那次戰事早經結束，對於一個城克服的遲早，斷無早報以跨張武功之可言。但是圍城中被難人的日記，也是很可靠的。這個官司，也許後人引經據典，爭個不了。那知事實是那次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戰役，往往把敵人包圍在城裏，不等城池攻破，即已前進，泰安也是如此。而執筆寫報告的人，以為軍隊已過泰安，即算克服泰安。這個疑團，是我親到泰安城下，目擊情形，才能解決的。又如報紙或定期刊物，也是一種重要的史料。研究鴉片戰爭的人，不能不參考當時廣州英國人出版定期刊物，共二百四十號，名叫“Chinese Repository”。這是一種重要的史料，但是這祇是英人的記載。當時中文還沒有報紙，可以供我們的比較。現在上海字林西報對於中國，特別是對於中外關係問題的記載，我們就知道注意糾正了。就以中國現在的報紙而論，言論記載，各有不同；我們天天看各種重要報紙，而且知道各種報紙的背景，所以能夠知道各報所載事實的真相。若是等到千百年後，各報之中，祇有一種是保存全部的，而且他的背景——甚至於某年某月一段時期的背景，——後來的史學家無從知道，祇根據他的記載來做史料，

來下判斷，豈不是大大的上當嗎？

第三，說到許多文件不能公開的，確是史學家一件憾事。寫史書的人，誰不願意把所有在他研究範圍以內的材料，通通看見，成一種名山不朽的著作。

但是這是一件不可能事。在搜集可能範圍以內的材料，未始不可供史學家畢身

精細的工作之用；而且不能公開的材料，除一小部分外交政治的祕密而外，其他的還是汗

牛充棟。況且歷史的著作，並不限於外交政治祕密的方面。即就外交政治祕密的材料

而論，也不是絕對不公開的，——雖然常有年度的限制。（但是我承友人的介紹，到法國

外交部去看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也開放到一八六〇年為止。至於他們本國人和政府

有接洽的，當然看到的期間更遲。如 G. P. Gooch 寫大英外交史，便參考過英國外交部最近

的材料；而 H. B. Morse 寫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也看過英

國外交部關於鴉片戰爭的檔案。）並且謝謝俄國的革命，把以前帝國的祕密文件，一齊

發表，或是公開出來。他們的紅擋裏面，不但有許多是關於西洋外交史的材料，而且有許

多是關於中國內政外交極重要的材料。（現在外交檔案全部不公開的，恐怕祇有日本，

這件事很受西洋學者的非難。）大戰以後有許多條約，也祇是公開的祕密。如威爾遜

文件的發表，Col. House 文件的發表，還有許多自傳，回想錄的發表，都是留心的史學家最

好取材的寶藏。就以中國近代史而論，除了民間社會的材料而外，就是政府的文件，最大部分也是公開的。如「內閣大庫檔案」、「軍機處檔案」等等，都分藏在故宮博物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處，可以自由參考。從總理衙門、外務部、外交部一貫下來的檔案，都有鈔擋可以調閱。況且中國的外交內政，簡直沒有多少的祕密可言。史書的定本一層，却是更難說了。老實說，史書就永久不能有最後定本的。古代史的標準著作，常常因新的發現，新的採掘，而有變更。如殷墟的發掘，便變更了許多我們對於殷代文化制度和世系的觀念，值得我們重寫一部殷代史。就是沒有新的發現，則因後來的生活愈益演進，對於前代的了解，愈益增加，並且愈有不同的觀點。（這個道理，我也在另文研究。）

知識的探討如果一日不停止，則誰敢說他的著作，是最後的一部呢？

比較起來，「文獻足徵」而且「所見異詞」優於「所聞異詞」是研究近代史所佔最重要的優勢。在目前的不研究，難道等到將來湮沒以後，對荒邱而太息嗎？所以我覺得在國外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應當積極研究本國史，或是本國近代史。我不是說中國人聰明才力，盡心去研究外國史，不能和外國史學界權威抗衡，乃是說除非他能終老於外國，不然即以材料的方便而論，要與外國對於史料予取予求，終日摩娑的學者，去爭一

日之短長，或是百年之大業，是很難的。況且學術的眼光，是把一切材料都作平等待遇的，不見得遠方來的藥材，便要靈些。又何必舍近就遠，舍己耘人呢？

近代史的文獻雖然多，——不祇是文獻，就是實際的物件等等也是多，——但是喪失的快，也是可以驚人的。鴉片戰爭時所用的噴筒，——當時重要的火器，——至今我不過在南京第一公園裏，看見一個。庚子戰役時的武器，旂幟，告示，以及民間所貼的『花紙』，祇有外國的博物院和圖書館裏，還可以看見。就是辛亥時候的報紙雜誌，現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四處登報招求，已經有許多是不可再得的了。建築雕刻最近被毀於水火兵災的，更是不可勝數。這種文物的淪亡，是極可傷心的事。如實際的物件等等之保存，祇有靠國家或是大規模團體的力量，和一般人民的歷史興趣。如國立歷史博物館，是亟亟於要建築的。至於檔案一層，更非靠國家的力量不可。如英國的 Public Record Office 是一種最好的制度；但是中國還沒有談到。十七年國民革命軍進北平的時候，我眼見各部檔案散失，並且想了許多法子去挽救；雖然不無效果，但是終因範圍太大，機關太多，致告束手。曾經建議設立檔案保管局，也因為財政困難，不能實現。從研究史學的人看去，是多麼可以痛心的事！有如太平天國的文件，當時因觸犯禁忌，幾乎全部消毀掉了。在國

內除故宮博物院裏略有發現而外，我想太平天國滅亡以後，兩江總督衙門和布政司衙門裏一定還有存着的。但是我訪求了兩三年，知道經過迭次的兵災，完全喪失。英法聯軍戰爭以前，中國的外交中心是兩廣總督。但是兩廣總督衙門的檔案，在一八五八年廣州失守的時候，大部分喪失，一小部分被擄到歐洲去了。祇落得我在歐洲的時候，還在舊書攤上，買回一百多件。（其中有一件是葡萄牙駐澳門理事官諉嚟哆，關於禁煙問題，向林則徐具的甘結，有親筆簽字和火漆印章。）國內總理衙門及以後外交機關的檔案，卻有二萬多本的鈔擋，雖經拆訂了一部份，弄得很凌亂，已經是最難能可貴了。（至於原檔，已經凌亂損壞散失不堪。譬如十八和十九兩年，我去研究中日戰爭檔案的時候，想調閱李鴻章和俄國所訂中俄密約的原文，登記簿子上說是存在一小白皮箱裏，據一個從外務部到外交部服務將三十年的職員說，此項密約原文和這個箱子，早已不見。當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與會的國家，要求中國發表原約，但是徧尋不得，後來一個不重要的職員，在地下的亂紙堆中發現出來，現在又不知去向。華盛頓會議的記錄上所載的，是否即係原文，抑係譯本，中文原文如何，均不得知，真是可惜。）如袁世凱的時代國務院的公文信件，我為清華大學圖書館論斤的買了許多，燕京大學也買了不少。可見其餘機關檔案散失的情形，

真是一幕慘劇！若不積極保存，將來更不知道散失到了若何地步。

國家的檔案，當然主要的還祇有靠國家保存；但是在國家的力量和當局的認識，還沒

有到這問題來的時候，各處圖書館應當盡他充分的力量；而史學家的尋訪搜集，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雖然不能和國家去令部保存的那樣痛快，卻也是一個不小的力量。『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千仞之岡，始於培塿，九達之衢，肇於跬步。』恐怕要成尋訪搜集史料者的格言。尋訪搜集以後，還要繼之以整理，考訂，發表。其實什麼是歷史研究法？嚴格的講，歷史研究法祇是史料研究法。德文所謂『阿瑞斯踢克』(Heuristik)的學問，正是搜集史料的學問。發表一層，也很重要。雖然不能全部發表，不能不有精密的選擇，(選擇標準一層，自不能不起爭論，)但是爲自己和後人的運用，以及將來的流傳起見，這種困難，是不能免的。在寫史書以前，史料叢書的編訂，是必經的階段。如德國的“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英國的“Rolls Series”，和法國的“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正是這一類的重要貢獻。最近德國的“Die Grosse politische”，也是一個史料的寶藏。中國以前的『長編』也髣髴有同樣的性質。所以章實齋關於史料整理的意見，說是理宜先作長編。長編既定，及至纂輯之時，刪繁就簡，考訂易於

爲功。參看章氏遺書卷十三

章氏論史，以「記註」與「撰述」並重，因爲名詞的用法不同，他所謂

史學，祇限於史書。他說，「整輯排比謂史纂，參互搜討爲史考。」但是纂史考乃是達到精

確的史學所必經的階梯，所以他說，「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譜，皆不可用，然捨

此二者，無所以爲史也。」參看章氏文史通義此處所謂史係指史書本身而言可見這種認識，是中國從前的學者有

過的。爲求中國有科學的史學和精確的史書起見，史料叢書的編訂，實在是基本的工作，

而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將所有的史料一齊發表，固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將其有重

要性的下一番「整輯排比」或是「參互搜討」的功夫，實在是新史學的基本建設。若

是真有重要的史料，能得其完整的更好，萬一不是完整的，也不當遺而不收。「吾猶及史

之闕文」豈不也是一件可幸的事嗎？

近年來中國很有人注重歷史研究法。這雖然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但是高談方法而

不去做實際應用方法的工作，是不成的。讀一百部科學方法論，決不能產生一個大科學

家，或是一個重要的科學貢獻；讀一百部歷史研究法，決不能產生一個大史學家，或是一部

重要歷史的著作。大科學家和重要的科學貢獻，是從實驗室裏，繁瑣而極費耐心的工作

裏，產生出來的；大史學家是從史料的灰堆和凌亂的文件裏產生出來的。「大匠能授人

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是一切發明貢獻的基本條件。巧是從運用一部分確定範圍以內的材料到精熟的程度，才能產生的。現在西洋大部分的史學家，真所謂「席豐履厚，」有人已經替他們做過了搜尋整理的工作，（但是研究西洋中古史的人，便不見得有這種的福氣；還有許多「銀拉丁」的材料，非自己整理不可的。）在中國的史學家便不能袖手旁觀，要有自己的工作，非自己下手不可了。

再限定範圍來講。我覺得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期。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於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國近世史方面要做任何工作的話，我便認定從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下手。這件事我不問自己的力量薄弱如何，確有具體的計畫。材料的搜集，自當隨地留心。材料的編纂，也有確定的分類方法。因為材料不是全部可以收齊，所以祇能隨得隨編，不能問年代的順序，或是事件的先後。不望在短期有大批的發表，祇望能夠持之以恆，做一種日積月累的工作。因為公家的機關常有變動，往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為持久計，所以不能不借重商業機關。這件事當然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以更渴望國內有志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隨時予以幫助。我所謂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

史料的方法。

要整理浩瀚而且零亂的中國近代史料，來編成叢書，我以為應當分成三大部分，可以稱爲「類」以下再分爲「編」。

第一類便是中國文的史料。研究中國史，當然中國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外國「漢學家」研究中國史不能及中國學者的地方，就是中國學者運用中國材料，比較便利比較豐富。如 H. B. Morse 雖然參考了許多西洋的材料，但是對於中國材料，便無法用以佐證。無論他如何精細，但是他運用的材料，祇是使他看見一件事的半邊。而中國人則除着中國材料而外，還能通外國文字的也很多，本來大可有爲，祇是棄而不用罷了。中國史料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部分：

(一) 檔案 除了散失的而外，所存檔案，還是浩如煙海。即就當年中央政府的檔案而論，則軍機處和內閣大庫的檔案，存在故宮博物院所屬的大高殿和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京大學的博物館或圖書館裏，已經充棟，運起來一定可以汗牛；其中有許多是沒有發表過的。近年如故宮博物院刊印夷務始末和各種定期刊物，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刊印明清史料等書，都是很有價值的工作。留中的密摺，故宮博物院也有過刊印的提議，希望能夠早

日實現。這種大規模的刊印，當然祇有希望這幾個主管機關辦理；但是散失在外的檔案，如我在歐洲所得兩廣總督衙門的檔案，未始不可印行。最近林璧予先生刊印林則徐信及錄，也是禁烟的重要檔案。許地山先生從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鈔回刊印的達衷錄，乃是一種公私混合的檔案。當許先生在牛津讀書時候我到牛津去搜集史料和他在圖書館同他鈔寫的方法和他囑咐排印的款式都極好。若是可能的話其他史料的印行可以取法。研究檔案，自然也還要批評的眼光。蒙混『聖上』睿鑒』的奏摺，亦屬不免；但是關於年代時期等項，檔案比較可靠。

(二)官書 從先中國每個朝代，都有欽定的官書，如平定粵匪方略等等都是的。其中粉飾的地方很多，但是苟能辨別，也有許多可用的史料。如許多清代的實錄，都存在故宮博物院裏，沒有刊行。名為實錄，其實有許多『不實不盡』的地方。不實的地方，不能盡舉了。即如不盡的地方，顯然可以露出來的很多。我在故宮博物院裏調閱光緒一朝的實錄，翻到庚子拳亂的幾個月，關於拳亂的上諭，幾乎完全沒有；祇存了一個上諭，說是叫董福祥把在北京應辦之事辦完，可以分兵到天津去。這分明是指打公使館了。自拳匪在北京猖獗，以至於議和開始一段期間的上諭，本來是在事後有上諭取消，要重付審查的。所以實錄自然不錄。要查這個時代的上諭，還得找當年的京報，和天主教的中法文彙

刊的拳時上諭，但是這些實錄，也應由主管機關刊印爲是。東華錄可以說是一部「半官書」，並且介於檔案和編年著作之間，裏面的材料實在很多。但是我發現幾個上諭和奏摺，有利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原稿不同的。若是有人考訂出來，或是將散漫無系統的紀錄，按題分類的輯錄，和蔣廷黻先生編的中國外交史資料一樣，自然也有相當的用處。

(三)禁書 消滅犯當代忌諱的文件書籍，在中國是很平常的事。如太平天國一代的文献，便消滅殆盡，在中國是很難找到的了。太平天國所刊布的書籍，有目錄可查的計二十一種。我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和東方學院所看過的，有十九種；而且把大多數的手鈔了帶回國來。如天命詔旨書、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朝田畝制度、天父下凡詔書（不同的兩種）、太平勸世誦、十全大吉詩等等，都可以研究太平天國的組織和思想。如牛津所藏洪仁玕上洪秀全的資政新篇一書，可以代表太平天國裏面的開明思想，簡直把康有爲的公車上書提早了四五十年。（在東方學院的部分，程演生先生曾經鈔了回來，刊爲太平天國史料第一輯；但是很不完全，有重刊較爲完全本之必要。）至於曾國藩教他的屬員張德堅等編纂的賊情彙纂一書，其中關於太平天國可靠的文件甚多；雖是官令編纂的書籍，供他研究太平天國內情之用的，然

其終未刊行，恐怕也有當心觸犯禁忌的關係。像這類的史料，也應當刊行。這不過是舉太平天國一件事做例，其餘的禁書一定很多，不過有時要『禮失而求諸野』罷了！

(四)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 檔案雖有不開的，但是在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裏面，公開的實在不少。如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全集，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遺集等等，都是關於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史料。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人，尤其是少不了李鴻章的李文忠公全集。這都是指主要人物的而言，至於次要人物的，更舉不勝舉。其中未刻的還是很多，就是已刻的，也有許多難於收集。如景善日記的原稿，一部分則藏在大英博物館，一部分還在J. O. P. Bland家裏。E. Backhouse和J. O. P. Bland合著的“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中曾發表一部份，是Backhouse譯的，而Bland嫌他的英文不好，自己不按原本，以意修改，所以發表以後，許多漢學家以為是Bland偽造的。Bland為自己洗刷起見，將一部分存在大英博物館裏，我親自看過鈔過，真實無疑。但是還有一部分至今未曾發表。）近來國內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日記，如曾國藩、翁同龢、李慈銘等日記，都是幾十年連貫下去的。這是史學家最可歡喜的事。如郭嵩燾的日記，至今未印。最近如譚組庵先生的日記，不知何時可以發表。這都是應該即速印行，或是妥為保存的。至於

這些日記之中，有許多顧忌太周，或是有重寫嫌疑的，如翁同龢關於戊戌政變的日記，從史學家的眼光看來，都應當細細偵察。這些全書和日記，卷帙浩繁，而且有許多不關史料的地方，似應按照問題，分別節刊。這也可以使將來的史學家，省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五) 專家著述 關於中國近世史的專家著述，本不算多；但是也不能說是沒有。如魏源的聖武記，王定安的湘軍記，杜文瀾的平定粵匪紀略，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易孔昭等的平定關隴紀略等書，也未始不是費了許多精力的著作。這都是已經刻過的。沒有刻過的如梁廷枏的夷氛聞紀（記鴉片戰爭）琴閣主人的觸藩始末都是應當刊印的史料。不過許多錯誤疏略的地方，最好能有相當的考訂。

(六) 定期刊物 這差不多是研究近代史獨有的材料，雖然在中國發達較遲，卻也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如北京的京報，雖是公報性質，也有不少的材料。鴉片戰爭時代澳門的報紙，以及後來上海香港等處的報紙，都是很好搜集史料的地方。不祇是新聞可用，就是廣告也可看得出當代社會制度和生活的情形。（如 J. M. Vincent 在 “Historical Research”，一書上說看一七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國 “Boston Evening Post”，一個賣黑奴的廣告，可以看出當年美國奴隸制度的情形，和當年社會對於黑奴問題的心理。）不

過這種繁重的材料，應當按照問題去選擇和錄取，並且要明白各種刊物的背景，運用明銳抉擇的眼光，不然是要誤事的。至於不定期刊物，雖是間斷的連接下去的，也應當注意。

(七)圖畫 中國史學家最不注重圖畫。要使史書有生氣，圖畫是一種有力的幫助。如一八五九年大沽口之戰，中國砲台打沉了四個英法的兵船，重傷了六個，可以說是近代對抗外國海軍惟一的勝利。而大沽口砲台的建築和竹簽泥港的排列法，祇是外國還有圖畫。就是什麼「劉大將軍大敗法兵圖」，「李中丞聯團殺敗洋兵圖」這類的花紙，也可表現當時中國的武器，中國的羣衆心理，中國人對外的知識等等，正不必以其愚昧爲可恥。當民國十六年清共的時候，日本人將上海的各種標語，照下像來，印成二冊。這是何等留心！何等利害！從史學的立場上來看，搜集，甚至於選擇，這種材料中有價值的來復印，以備將來的史學家應用，也不是枉費精力的事。

第二類便是外國文字的材料。因爲這類的材料，中國史學家還少有利用，所以我願意特別說明他的重要性。（元史方面，近來已經有好幾位學者注意西文的材料，但是他們還大都免不了間接取得的障礙，卻已經是難能可貴了。）若是把法官斷獄來譬方史學家著史，則一件案子的兩造，三造，甚至若干造，必須一齊問到才是。還有人證物證，也應

當通同調齊。斷沒有僅看一造的口供，就成立定讞之理。不知道他國材料，或是不能運用他國材料而寫中國近代史，則一定使他的著作發生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何況知用能用，而不用呢？近代的中國，不但在國際戰爭或外交方面受外國的影響，就是內政的變動，也何嘗不受外國的影響。或是直接的公文報告，或是間接的觀察調查，在外國文字裏，都有重要的文料；而且他們的觀察調查，有時比我們自己的還清楚。他們的文書之中，當然有許多爲自己迴護的地方；遇着這樣情形，史學家正應當連用自己的眼光，判斷方法，去識別，決不能掉首不顧。就是發現中國方面的錯誤，史學家爲對於真理負責起見，也儘可明白承認，做後來的借鑑；不應當諱疾而忌醫。並且因爲國際關係的複雜，和國際間利害的衝突，往往有許多第三國的記載，是很確實很公允的。——第三者有時常能站在公正人的地位。如關於中英的衝突，美國法國方面，或有持平的論調，可以供採取的。這也是近代史學家一種特殊的便利。還有一層，中國官書的陳述，往往有粉飾，誇大，虛報的地方。私家著述，有時也脫不了華夷——或是種族——的成見，二者所應當糾正的地方，正是很多。西洋的官書和私人著作，有時也不能免。如大戰時代各國發表的藍皮，黃皮，黑皮，白皮等書，往往於選擇材料之間，有意爲自己辯護。但是在事實方面，他們大致都比我們謹慎。（

如英國發表關於達達納爾海峽戰敗責任的官書，就是很坦白的。）講到中國近代史方面，則鴉片戰爭的各個戰役，中國那次不戰敗。敗到可掩飾的地步，當然文書上是轉敗爲勝，敗到不可掩飾的地步，——如炮台或城池失守，——也是我兵雖敗，但夷船被炮打沉了幾隻，夷兵溺死無算，甚至於海上飄流了夷帽甚多。好得事在海上，「朝廷」是無法追究的。如一八四一年虎門之戰，中國方面的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炮台失守，這是瞞不了的事；但是官報和私家著述，都說是夷兵死傷亦四五百人。英方的負責報告，則虎門攻陷，得炮三百八十門，中國官兵傷亡約五百人，英兵無一人陣亡。（在其他戰役，英兵傷亡者都有名冊可查，因此我認爲這種報告真確。）所以中國方面所謂四五百人，恐怕祇是「夫子自道」罷！又如三元里民團抵抗英兵這件事，是中國人最引以自豪，而史學家如魏源，也深爲太息痛恨，以爲可以挽回敗局的。以後這件事輾轉傳說，幾乎成爲神話。中國在鴉片戰爭受了這種的鉅創深痛，事後還是不知發奮圖強，三元里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爲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強，漢奸急於求和，我却不相信到了十九世紀的世界，還可以執挺以撻堅甲利兵。）據中國方面的記載，則三元里九十餘村的義民數萬，合圍英軍，聲震天地；當時英軍四面突圍，均不得出，結果英軍死了數百，其統軍大帥和軍官霞畢，都死在裏面；

不是漢奸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前去解散民衆，則英軍可以一鼓就殲。但是據英國統帥Gough於一八四一年六月三日致印度總督 Earl of Auckland的正式報告，則此事的詳形，是五月三十日廣州豎了白旗以後，英軍駐在廣州城的東北村中；他們發現大羣民衆，鳴鑼擊鼓，執刀持矛，由前面距離約三英里的高地而來；他們立刻派第三十七和第二十六兩隊迎敵（兩隊合計祇二百八十人）；後來第二十七隊前進過遠，失了聯絡，他們又派了印度騎兵第二隊去救；因爲天熱，Major Beecher中暑死了（這想去是霞畢顛倒的譯音）；而繼之以大雨，他們的子彈受潮，不好使用；以後接濟又到，終能支持；不過因在稻田中遇大雨，所以窘迫的情形，是可想而見的。英兵以毀廣州城相恐嚇，所以第二天廣州府知府來勸散了。這天英軍死了五個人，傷了二十三個，都是注明階級的，所以很實在。三元里事件的真相，不過如此而已！又如一八八四年中法海軍在馬尾的戰爭，據張佩綸的奏摺，和他濶于集裏的文件，『酣戰』了多少時候，抵抗是何等英勇；但是據外國文的紀載，則中國方面十一隻船，法國方面十隻船，（連兩隻魚雷）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五十六分開炮的，到兩點零二分戰事即已終了，中國的船通同毀了。這個七分鐘的戰事，也是一個破天荒的紀錄！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也可以看見參考外國文史料的重要了。

外國文的史料可以分爲以下幾部分：

(一) 檔案 各國的檔案，開放給學者參考的，各有年限的不同。歐美重要的國家，在一八六〇年以前，大致都可開放。所以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兩個重要問題的文件，大致都可以看見。其餘的祇要有相當的介紹，也可以有有限度的公開。他們還有許多公使館和領事館的調查報告，關於中國各種問題，都有重要的材料在內。有心研究的人，應當細心去研究鈔錄，翻譯，分類彙合起來發表。還有許多檔案附錄，或是夾雜在當事人的紀載，或是在學者的著述裏發表過的，如 D.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後面所附的軍事報告，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後面所附英國外交部的文件，H. Cordier: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57-58, et 1860” 和 Baron Gros: “Negociation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en 1860” 等等，都是應當隨時綜輯，翻譯成書，以備學者應用的。

(二) 官書 外國文中，很少有欽定的書籍，和中國欽定方略一類的。有許多官書，實際上還是公開檔案的性質，但是內容却很重要。如英國的“Parliamentary Debate”和“Blue Books”裏面，都有很重要的東西。如關於鴉片戰爭問題，Macaulay 和 Gladstone 兩派的

辯論，可以使人明瞭英國作戰的目的，藉口，和戰爭責任問題。關於鴉片問題，如“*A Copy of all Papers and Despatches at the Indian House on the Subject of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Subjects engaged in the opium Trade from 1830 to 1836*”等等，都是研究鴉片戰爭必看的材料。看英國國會裏的委員會召集廣州英籍的鴉片商的問答，可以明白林則徐繳烟時候的情形，可以解決一般英國書籍所說林則徐想餓死英商，是否事實問題。如關於太平天國的外交及其內部情形，英國藍皮書“*Taiping Rebellion: Papers respect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從一八五三到一八六三年出版的各冊，是供中國人研究太平天國問題必須翻譯的史料。其餘各國這種出版的文件尚多，舉一反三，大家也就可以跟着這個綫索去搜集。

(三)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 這種史料的重要，不必再說了。研究鴉片戰爭的人，總得參看 W. D.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Nemesis*” 是英國第一個鐵甲船，開來遠東作戰的。這是根據艦長 W. H. Hall 的記載) 或是 Mo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等書。研究英法聯軍戰爭的人，總得參看 L.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

他是英國大使額爾金的個人秘書，或是 H. B. Loch: "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 (他是機要秘書)或是 R. Swinholt: "Narrative of the North-China Campaign of 1860";或是 De Keroulee: "Souvenirs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他是法國大使格羅的參贊)等書。如一八八四至八五年的中法戰爭，中國人都說法國海軍提督孤拔被中國方面打死了。孤拔是否打死，可以看孤拔的信札 ("Lettres de l'Admiral Courbet")或是 Pierre Loti 在法國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上發表描寫孤拔臨死時候光景的文章。還有 A. Gervais: "L'Admiral Courbet" 也可參看。看完以後，才知道孤拔被打死的這件事，祇是中國人的一場春夢！如中法諒山之戰，也是中國人鋪張得有聲有色的，但是諒山之戰的實情如何，就不能不看 Commandant Le Comte: "Lang Son: Combats, Retraite et Négociations" 的上下兩冊，因為他是當時法國軍部的參贊。關於中日戰爭，不但有外國文的記載，並且有好幾個外國軍官，是參與戰役的。如曾任中國海軍要職的漢納根 (Von Hanneken) 便是在高陞船上被日本軍艦擊沉後泅水得活的，後來他回到德國，在 "Die Rundschau" 雜誌上發表了三篇文章，記載中日戰事甚詳。第一篇就是『高陞的沉沒』，講高陞如何先遇中國兵船，如何遇敵。

如何交涉，如何擊沉，真是詳細。請問從高陞船上事後逃出的人，有幾個呢？關於庚子戰役，幾乎各國文字裏都有史料。講到史館被圍和防禦的情形，可以看 Allen: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他是英使館的牧師）和 E. Darcy: "La Défense de la Legation de France à Peking"（二書均係日記體裁）等書。而聯軍統帥，鼎鼎大名的德國瓦德西死後，他人爲他編訂發表的三本回想錄（"Die Denksivurdigkeiten des Grafen von Waldersee"）在第三本上，幾乎全是關於拳亂的事情。外國人私人的記載，也有許多沒有發表過的。赫德（Robert Hart）雖然是一個總稅務司，但是李鴻章對外國接頭的事情，常是找他，差不多有二十年間，他是中外交涉的樞紐。他有七十四本日記，當然是極可寶貴的史料。H. B. Morse曾經提到過。他說赫德允許他用，但是他始終沒有機會用過。這部日記，現在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我曾經打聽過赫德的兒子，連他也不知道。（真是不肖之子！）若是真不見了，豈不是中國近代史料——特別是外交史料——上的一件大損失。總之這類的史料，是有翻譯，或是節譯，和考訂出版之必要的。

（四）專家著述 我常說外國漢學家關於什麼老子莊子的著作，最容易騙人，最沒有價值；但是如研究中央亞細亞東西文化關係的著作，研究雕刻磁器的著作，研究中國音韻學

的著作，（如最近瑞典學者格蘭的著作）和研究中國外交史的著作，的確是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即就外交史而論，他們對於外國文的材料，真正下過一番工夫。如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H.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和 T.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一類的書，都值得翻譯。（不過他們立論有他們的眼光，翻譯的時候，最好加以考訂。）其餘如各國教士和學者研究中國風土、人情、及迷信和祕密結社的書，因為他們深入內地，而且研究的期間很長，也是值得注意的。

（五）定期刊物 外國人所出關於中國的定期刊物，很有許多重要的。如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The Chinese Recorder," 專門性質較重的如通報 (Le T'oung Pao),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Revue de l'Extreme-orient" 等等，都有許多可以參考的史料。如法國的 "Revue Maritime et Coloniale" 一類的東西裏面，頗有在中國軍事行動的記載。我在法國的時候，並且常時去買十九世紀的舊雜誌的零本，如 "Revue des deux Mondes" 之類，尋找裏面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頗有所獲。在中國出版的日報，如字林西

報等等，不問他對於中國的態度如何，却是許多可用材料的淵藪。就是在外國出版的日報，也有用得着的地方。譬如李鴻章使俄和歐美各國一事，他行動的詳形，甚至於來往的文電，李文忠公全書裏面，幾乎全部刪去。雖然有一部傅相壯游日錄，但是無關重要。而李鴻章在外國的行動言論，各國報紙都天天替他做起居住；因為各國間互相猜忌的關係，而且特別偵察得非常留心。若是搜集起來，不但有意思，而且有趣。

(六)圖畫 外國人寫史書的時候，對於地圖畫片，（在近代是照片，）常是採取很多。

如 Lavisse 所寫的：『Histoire de la France』，這部大著裏，不知包含了精印的像片多少。因為這不但使史書有『活氣』，而且使讀者腦筋裏有一個深刻的影子。關於中國的事物，中國人不會注意到的，外國人却已為我們製成了多少畫片。如鴉片戰爭時候中國兵船的樣式，和英國兵船的樣式，正是兩方武器和實力最好的比較研究。如大沽炮台的形式，祇有英國畫冊裏面才有遺容，我以前已經說過了。

外國材料固須充分參考，但是他們的態度、立場、背景，是時時應當放在心上的。而且真偽問題，也須注意。不是外國人都是誠實的。如一個名叫 W. F. Mannix 做了一部李

鴻章回想錄，（Memoirs of the Viceroy Li Hung Chang）並且有美國外交家 J. W. Foster 替

他做了一篇序；當時許多所謂漢學家被他騙過了。（並且我不久看見中國留學生的博士論文，還當他真的材料引用。）其實李鴻章並沒有寫這件東西，已由李經邁否認。後來西洋景拆穿，那知是這位Mannix關在檀香山監獄裏，沒有事做，扯了一個大謊！我在美國的時候，常常看見火車站上有一種警告牌子，寫着『婦女們當心，處處都有拐子。』我們也可以換一套字句，在史料架子上釘一塊牌子，寫着『史學家當心，處處都有騙子！』

第三類就是專題研究的結果，也就是分題研究的結果。在西洋這種工作的成績，就是『摩洛哥格拉夫』(Monograph)。沒有一種史學要成爲科學的史學，不經過『摩洛哥格拉夫』這個階段的。不要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就是歷史上一個較大的問題，也從何處說起，若是不經過分題研究的話。因爲一個大問題裏面，往往包括許多小問題；非先將他打散來，分別研究清楚不可。譬如鴉片戰爭問題裏面，便包含了道光時代銀貴銅賤問題，禁烟問題，通商及關稅問題，沿海軍備問題，英國向遠東商業發展需要問題，具結問題，林維喜案及治外法權問題等等。英法聯軍戰爭問題裏面，便包含了中國履行南京條約問題（其中包括廣州入城問題），法國保護天主教問題，護海問題，賣旗問題，英國企圖開發揚子江問題，葉名琛個性及其外交方式問題等等，都是一時不能盡數，愈研究發生愈多的。必須

把這些單獨的問題，研究得有眉目了，綜合起來研究大問題，則對於這種大問題的著作，方才可靠，方才不致圖託空想。在中國近代史方面，還有許多工具的著作，要先準備的。如中西歷的對照，幸而已有陳垣先生的中西回日歷（徐家匯天主教士 P. Hosng: "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es Néoméniques Chinoise et Européenne"，實在是精心創始之作。這個人的苦工，值得表彰的。他是中國人，可惜他的中國名字，我至今還不知道。）但是關於太平天國的歷本和其他歷法的對照，至今還難推算準確。再如這個時代大事年表，也是應當先有的。郭廷以先生從事於此，關於太平天國一代，已經大致完成，我希望他能仔細修正，從速完工，以後再及其他時代。又如外國人的中西名字對照表，也不可少。往往同一個人，而中西名字，絕不相同，可以使人看了甲而不知其爲乙的。如南懷仁的原名是 Ferdinand Verbiest，湯若望的原名是 Adam Schall，張誠的原名是 Gerbillion 這都是極端的例。其他如 Gutzlaff 的譯名是郭實獵，Henri Cosnier 是高亨利，這還勉強易於想像。外國人給中國，或是中國人譯外國的地名，也有許多難猜的地方。如 St. Johns Island 就是上川島，而葡萄牙就是大西洋，都是顯著的例。像這類的情形，都應當有對照表，或是詞典。我曾經隨手記錄，摘了千條左右，想積成一部字典，但是不知何年何月，有積成的希

望。我是極希望有人先我而做的。總之這種專題研究的工作，非積極着手不可。外國大學裏面的博士論文，教授也大都是指導學生做這種工作。因為這不但是一種極基本的工作，而且是一種極好的訓練。我希望除專家從事以外，國內大學歷史系的研究院，趕快着手。

綜括起來，我們大致可以認識歷史的性質，意義——尤其是研究中國史中近代史一部分的意義。我們不能不放開眼光，擴大範圍，隨時隨地，和獵狗似的去尋材料。除本國的而外，向外國文字裏去找材料，以資參證，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必需的。我此地所舉的，不過是我材料的路徑的大概，當然不能包括無遺。我所提出的例子，多在軍事、政治、外交方面，不是說史書所顧到的祇是這幾方面，乃是其他的方面，不及備舉。材料得到以後，還有整理、翻譯、考訂的苦工。而分題研究，所謂『摩洛哥拉夫』的工作，尤其是科學的史學的階梯。必須有這各部分的史料叢書幾百種以後，才可以動手寫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做學問應當有不計近功的精神。所以就是有人笑我們『祇見鑼鼓響，不見人出來』也是不要緊的。建築華廈於流沙之上，或是用紙殼子來糊成房子，風雨一來，全部崩潰，是最值不得的。祇要我們有決心，肯耐苦，把這基礎，或是基礎的材料，準備好來，也無須一定要自

已來寫成全著。所謂『勤成刪定，歸之於後來之筆，』正不必自我成功！

民國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南京。

論 著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一六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433B

史

900.901 / 0006